

☆☆☆☆

毛澤東論知識分子

任弼時論知識分子

夏衍論腦力勞動者的道路

毛澤東論知識分子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

張孟聞論科學工作者與政治

中央文獻室編，任弼時、夏衍、張孟聞、毛澤東著，中共中央文獻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年。

毛澤東論知識分子

蔣荷生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數十年來，中國已造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群與青年學生群。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並為他們服務而反對革命的知識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使他們遭受着失業、剝削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了現代的科學知識，~~所以~~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能夠起着先鋒的橋樑的作用。辛亥革命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明顯的例證。尤其是重大的比較窮苦的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與接收，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與民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民衆利益服務並使其生活群眾化之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有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參加革命到最後勝利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時，就往往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

竟變成革命的敵人，陳獨秀、張國燾就是這少數知識分子的代表。知識分子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陸，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群眾鬥爭中才能洗刷乾淨。（摘錄自「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了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與教育事業，文化人與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為着掃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為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與普通文化工作者，以「為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從事艱鉅的工作。一切這些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與社會的寶貴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鬥爭中，在八年抗日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偉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與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

識分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與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教育，應當採取適當的但是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對於由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摧毀中國人民的精神與肉體的那種不知衛生的愚昧與疾病疫癘的嚴重情況，應當講求積極的改革與救治辦法，推廣國民衛生事業。

對於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及舊醫生們的態度，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中國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與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與新教育。

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中國文化運動的借鏡；盲目服從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批判地吸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在為着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鬥爭的總方針下，共產黨人應不要分階級、信仰與黨派，和一切知識分子很好地團結起來。（摘錄自《論聯合政府》）

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论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行稱為科學形態的、週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有了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

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爲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戴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呢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的馬恩列斯，每本又背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去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賞格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夠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應用，現在作與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麼，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大

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二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得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再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們，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種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而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樣呢？一個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就有知識了，但是他們

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末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柱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要苦，(笑聲)煮菜做飯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十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闔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麼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讀轉共（布）黨史這樣馬虎從事。他從商品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革命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別的任何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

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就是阻止了理論的開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貴的。但是，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手過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死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它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活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兩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部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

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把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經驗主義。他們都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而努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過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都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瀟灑的青年人，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到良好的先導，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是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的要對準靶。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

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的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為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食理呢？（笑聲）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是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為了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愚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改黨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該用於中國，從中國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繫，那末，講一百年也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摘錄自「改造學習」）

任弼時論知識份子

知識分子中，有許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我們應採取什麼政策呢？

我們對於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對於知識份子如何看法？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幹的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對於這些腦力勞動者，民主政權應採取保護他們的政策，並且應當儘量爭取他們為人民共和國服務。

這些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是有知識和專門技能的，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謀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過着經濟上很困難，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還有不少的失業者。至於在科學上創造發明的機會，更是少極了。他們中也有極少部份人，是堅決跟反動派跑的，但是極大部份人看到了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種種腐敗反動，而對國民黨統治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表示不滿，對於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抱着某種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態度，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他們適當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為着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至於學生，從國民黨城市近幾年的學生運動及我們整頓三風查幹部的經驗來看，絕大部份學生是不滿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要求民主的。去年一年，三大大學生運動，是我們在農村中實行土改的時期爆發的。許多傾向革命的學生，包括若干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並不反對改革土地制度，積極地為民主而鬥爭，因為他們逐漸認識到土地改革是他

們所要求的民主的一個基本部份。其他的許多學生，因為看到了革命發展，天下將是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全國建立的這種大勢，也可能接受進步思想，逐漸轉到民主方面來，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統治。在廣大的學生群衆中，反革命特務分子是有的，但他們只是絕對少數之學校中的三青團員，也並不是個個都堅決反對革命。其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只是一個極小的部分，是不可救藥的反動分子。因此我們對學校的知識分子應該分別幫助他們進步，領導他們參加革命鬥爭，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解放區內已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還在繼續發展。三五年內，革命就要在全國勝利了。我們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就必須要有知識。例如建立一個醫院，要設內科，外科，婦科，小兒科，牙科等，就要有許多學生，醫助，護士。這些人才，要經多年學習和實際工作鍛鍊，才能培養出來。例如要修一條鐵路，必須有工程師和其他的技術專家，就要有大批段長、站長等。又如被戰爭破壞了的鐵路，將來要迅速建設，還要建設新的鐵路（現在在解放區的後方就已經在建設），靠我們軍隊的工兵連當然是修築不起來的。又如土地改革後要提高農業生產力，我們就要有許多農業專家，來改良種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們辦兵工廠製造槍砲子彈，就需要許多工程師、專門家。開商店，搞貿易，需要許多會計。辦學校，要教員。這一批技師、專門家，科學家、教員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養出來的，要有專門的學校來培養，多年才能畢業。我們目前還沒有如此多的有知識的專家，我們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門家，替人民辦事。我們要使用這批知識分子，教育和改造他們，糾正他們許多人輕視人民脫離群衆的邪氣。他們的大多數是有建設熱情的，在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建設事業

中，其中的大多數一定是會進步的。

現在農村中還有許多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沒事做，我們也要想辦法來爭取和改造他們。只要他們表示願意服務民主政府法令，特別是土地法，不反對共產黨的政策，願為人民服務，不進行破壞活動，如有違法行為甘受政府法律制裁，我們就可以讓他們出來工作。可辦各種訓練班，訓練技術和政治，慢慢改造他們，然後分配他們以適當工作。但不要在用在緊要的崗位上，而且要經常提高警惕性，防止他們中有些壞分子的破壞。經過長期考驗過的，才可放在重要工作崗位上。

我們要防止因為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關的知識分子，這對人民的事業，是有害的。同時，更要注意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農民得到知識，並將他們中的優秀份子或他們的子弟培養成知識分子，培養他們負擔建設任務。如果不能利用舊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養工農知識分子，那就會要犯錯誤。（摘錄自「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

夏衍論腦力勞動者的道路

——光和熱是怎樣發出來的

日前，在「文訊」雜誌上看到來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今天的詩，介紹何達的詩集：『我們開會』」，其中一段話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啟示，這一段話是：

「傳統詩有『我』，所以強調孤立的個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的詩人。青年代却要揚棄這種詩人。何遠在『我們不是』詩人」裏說：

「詩人」們啊

你們的靈魂發酸了

你們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言語

閉着兩隻手

什麼也不做

——滾你們的蛋吧

「詩人做了詩了，就有一個詩人的圈子將他圍在裏頭。不論他歌唱的是打倒禮教，人道主義，愛和死，享樂和敬感，或是折磨和信仰，那總是劃在一道圈子裏，躲在一個角落裏，不能打開自己，不能像何遠說的『火一樣的公開了自己』（無題）。這種詩人的感興和主題往往是從讀書甚至於讀詩來的。讀書或讀詩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現實生活究竟隔了一層。目下大家得在現實生活裏掙扎和戰鬥，所以何遠說：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頭門」

木匠的「鋸」

農人的「鋤頭」

士兵的「槍」，「我們不是『詩人』」。

「這樣抹掉了『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隊伍裏，用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加那集體的生活的鬥爭，是現在的青年時代。」

我不懂詩，其實應該老實說，對於「玩弄自己的思想」，而又讓「別人玩弄你們的語言」的所謂「詩」，甚至頗有一些反感，但是，單就着這裏朱先生所引用的這幾行詩，就不僅懂得而且被感動了。因為這些話不僅適用於詩，而且也可以適用於全般的文藝工作。我們文藝工作者是最歡喜提到靈魂的。那麼讓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的靈魂已經發了酸了？為什麼會發酸，何達先生的詩裏說得很明白，是因為「閉着兩隻手，什麼也不做」的原故，思想一旦成了玩弄的對象，這就表示這所謂「思想」已經和生活脫了節，把自己「劃在一道圈子裏，躲在一個角落裏」，實際上，這已經不止於「閉着兩隻手」，而且也等於「閉着一個腦」了。古人說「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思想和生活脫節，生活脫離了鬥爭而停滯下來，那就難怪靈魂要發酸了。

從這些詩的啟發，使我聯想到最近郭沫若先生發表在「群衆」上的一篇文章：「腦力勞動者對五一號召應有的覺悟」。這篇文章更明白地講了「貴族文人」和「腦力勞動者」的分別：

「今天的所謂文化人便是舊時代的所謂『士』或『士大夫』。『士』居於四民之首，是官僚候補者，統治階級的層次機構，對他都是以准貴族看待的。今天的所謂文化人，有的甚至又被稱為社會賢達，在這些稱謂裏面，沿着舊時代的遺習，不用說依然包含着尊重的意思，然而也無可掩飾，是有菲薄和萎落的濃厚的臭味了。這是時代的進展，也是文

化人自己的不長進。大部分的文化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却頭昂天外，目空一切，辱罵上下，舌鼓雄黃，實在是值得受人蔑薄和奚落的。今天，作為一個真實的文化人應該澈底覺悟的時候了。這正當如哈市的腦力勞動者職工會和朱其文市長所指示，要使文化人或知識分子自己明確地認識自己也是一個勞動者，而更進一步要使「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合作，發展生產」。這樣並不是低落了文化人，而實實在在是把文化人從菲薄與奚落的恥辱中救起，今天能夠充當一個勞動者，能夠有資格和能力配充當一個勞動者，實在是很大的光榮了！

舊社會的「士」，「士大夫」，「貴族文人」，乃至現在「青年代要揚棄的這隻詩人」，仔細想想，實際上都是「困着兩隻手，什麼也不做」的脫離了社會生產的寄生階級。他們的生活過去是兼「租蔭」，兼「官俸」，現在呢，有的依舊兼「租蔭」「官俸」，但有的也只能煮微薄的稿費了，很清苦，但也還沒有到迫使他們非離開自己所劃定的那一個圈子，自己所躲避的那一個角落不可的程度。他們的工作呢，不能說沒有，但大部分依舊還是從「讀書或讀詩」得來，還脫離不了「玩弄自己的思想」，和讓「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語言」的範疇。這一個圈子已經很窄小了，衣食住的壓迫已經很嚴重了，政治氣流的壓力也已經使他們很苦悶了，但是他們覺得這一個圈子才是他們的「本分」，才是他們「安心立命」的地方，捨不得「抹掉」這個圈子，一走到人民隊伍裏「去」，而自己明確地認識自己也是一個勞動者。和尚離不了廟，讀書人脫不下長衫，文藝作家跳不出「玩弄思想」的圈子，這與其說是生活的惰性，與其說是對於「文化人優越感」的眷戀，我覺得不如說是對於「參加集體的生活鬥爭」的疑懼和避忌，不如說是知識分

子的階級特性限制了他們의思想和行動。假如知識分子的文藝工作者不能搞通思想，不能明確地認識自己也是一個應該參加社會生產（智力方面）的勞動者，那麼一方面所謂正義感和氣節都可以在自己的切身利害前面崩潰和瓦解，而另一方面却因為還有一個可以躲避的角落，還有一些可玩弄的思想，於是他們就會用「優越潛在觀念」來掩飾自己的「自卑感」，自我欺騙，自我慰藉，自我陶醉，這就是「大部分文化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却昂首天外，目空一切」的原因了。

現代文藝工作者之間有兩句講得最頻繁的話，一句是「文藝工作者是人類的靈魂工程師」，另一句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假如真的是工程師，是實際的工程師而不是空頭的工程師，那麼他不僅要設計藍圖，而且還要和實際的生產勞動緊密地聯系。一個工程師而依躲在一個角落裏畫藍圖，不管這圖樣和實際工程適合不適合，不管根據這藍圖造出來的工程對社會對人群有沒有用處，甚至不管這藍圖可不可以轉化為實際的工程，那麼這樣的工程師祇能說是在「玩弄着自己的思想」，這樣的工程師對於實際社會的生產事業是絲毫也沒有貢獻的。至於後一句話，「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在科學的意義上，應該說是一分能（power），生一分熱，發一分光才夠嚴密。知識分子有知識，有技能，無疑的他們是有「能」的，而他們所有的「能」，也正是社會生產中和靈魂建築中所需要的，可是，這兒要注意的是假如這種「能」永遠的祇是一種「潛能」（Potential energy），那是不可能生熱，不可能發光，不可能產生出工作（work）來的。要使「潛能」化為熱，化為光，成為對人群有用的「工作」，一定先要使「潛能」轉化為「動能」（Kinetic energy），這裏就接觸到「動」這個字了。

要使「潛能」成為「動能」，要使文化人的知識成為勞動着的腦力，我覺得同樣的可以用物理現象來解釋。就用電來做比喻吧，中學校的物理教科書就告訴我們，電力的大小是和電流的大小成正比例，而電流的大小，却是由一個叫做「歐姆氏定律」(Ohm's Law)來決定的，用 I 代表電流，用 V 代表電壓，用 R 代表阻力，這三者的關係是：

$$I = \frac{V}{R}$$

就是電流的大小與電壓的高低成正比例，與阻力的太小成反比例。電壓愈高，電流愈大，但是阻力愈大，電流愈小。年青時候學電工，我非常討厭電流的性格，因為它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性格。它是一個取巧者。它是儘可能的避免一切阻抗，專望阻力少的地方走的。但是後來想想，又覺得這想法是不對了。避難就易，這是人與物的常情。一方面說，祇要電壓高，胆怯而受取巧的電流還是會經過錫絲一般阻力大的線路，而發出光和熱來，而另一方面從反面說，這線路上的阻力，不也正就是使電的「能」轉化為光和熱的必要的條件麼？現在用這個比喻適用於我們要說的問題，我以為電壓代表着文化人的思想，電流代表着文化人的力量，就光他們可以發出來熱和光；而在此，要使文化工作者的「能」轉化到「工作」，思想是一個前提，提高思想就等於加強電壓，但是單單加強電壓而假如不讓它走過有「阻力」的道路，光和熱還是不會發出來的。換言之，假如文化工作者的思想不能和勞動結合，不肯去走阻力很大的艱苦道路，不去「參加那具體的生活鬥爭」，那麼他們也終於不過如何達先生所歌唱一般的「玩弄着自己的思想」，「閉着兩隻手，什麼也不做」，決不能對人群社會的生產進

說有所貢獻的。

從這個比喻，我覺得想通了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性格，由於他們階級性的限制，常常是軟弱而受掙阻力小的路子走的，正如電流一樣，假如前面有平行連接的兩條或者兩條以上可走的線路時，它必然要向阻力最小的路線走的，但假如客觀的現實切斷了一切沒有阻力的道路，到了「路只有一條」，而這條路又是阻力很大的時候，那麼祇要他們有足夠的思想上的認識，有足夠的能動精神，他們還是會經過有阻力的道路，自我鬥爭和與環境鬥爭，而從這種鬥爭中發出熱和光來的。

知識分子文化人是「可以向社會貢獻的『能』的」，是具備着可以轉化成光和熱的「潛能」的，但是要使他們所有的「潛能」全部轉化成「動能」，發生出光和熱，就必須認識到自己是一個腦力勞動者，參加到集體的生活鬥爭裏去，「火一般的公開了自己」，不虛弱，也不要自菲薄，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的身份規定為一個腦力勞動的生產者，要工作，同時愛工作，這正如「我們不是」詩人「最後一節所歌頌」：

「我們要求着『工作』」

我們熱愛着『工作』

需要詩

我們才寫詩

需要生命

就交出

我們的生命」。

這是理性的「要求」和感性的「熱愛」渾然一致的境地，祇有這樣，「詩才和生命」等值，詩人才可以內心毫無覺悟而傲然地說：「詩就是參加生活鬥爭的工具，詩就是參加腦力勞動的生產品。這樣，詩人的『能』就成了『工作』，對人群貢獻了光和熱，詩人也就心安理得地成爲一個腦力勞動的生產者，而不再是一個『靈魂發了酸』的加括弧的『詩人』了。」（群眾一卷廿三期）

張孟聞論科學工作者與政治

在二月六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的週年大會裏，侯德榜先生說科學工作者最好不要投入政治圈內裏。他以爲一個科學人才的養成，不論是學術性的或技術性的，實在是經時費力，好不容易；一旦插身政治界裏便變得隨機應變的政治人物了——即使不夫爲一位政治人物，但並不一定就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未必真可以幹得很好；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夫去了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了。學非所得，用違所長，就社會造就人才與個人自己成就來說，兩面都是損失。他又隨便舉了幾個實例，以爲古今中外的科學人士之介入政治圈子者，無不失敗；惟一成功的人物是 Benjamin Franklin。

跟着說話的任叔永先生就說科學脫離不了政治。科學即使無意於過問政治，而政治却直接影響到科學。所以科學家倘使自己不爲科學發展設計籌劃，那些外行的政客們就越俎代謀替科學家來規劃工作規範了。如果永利公司改歸國營，今日所殘留的局面，一定更爲悽慘。

這裏存在着兩個論點：一個是科學工作者應否自己投身於政治界；另一個是科學工作者應否過問政治。前一個問題是捨棄了科學工作者的本身崗位而整個地投身於政治活動裏去；後一個則是分一部分精力關切到與本行有關的政治問題。侯先生的主張實際上並不與任先生的衝突。他祇是不贊成科學家整個地拋棄了本身崗位而從事政治；可是他卻希望科學家關切到與本身有關的政治環境。在同天下午的專題討論會上，他就說：要工業的高度發展，需要四項條件。這四項條件是：人力、物力、財力與好的政治環境。很明顯地提出了他的積極主張來。這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但兩兩對照一看，就可見到侯先生的真意所在。消極地說，他是不贊成科學工作者介入政治圈子裏去做一個政客，或好一些說來，是政治人物；積極地說，他贊成科學家過問切身有關的政治問題。因為他就幾十年與范旭東先生創辦永利公司與抗戰後接署幾年的經驗來說，他當然深刻地體驗到國內政治環境所給永利的優裕與創傷的。任叔永先生的話，真是慨乎言之。我相信侯先生也很同意於他的如果永利改歸國營那個警句的，就因為我們大家共同生活在這個政治環境裏，大家都看到——聽到，甚或是親身經歷到。

為各別科學工作者着想，尤其是難得有很好根基的科學工作者的中樞，侯先生主張科學家不投身於政治漩渦裏，與其說他是保留了士大夫薩士清流的遺風，無寧說他是特別珍視這些科學人士，而有所偏愛。實際上這是各個人的性情癖好，侯先生祇能希望別人這麼辦，却無法要人遵照着這麼做的。政治在現代已經是一件很繁重而且很複雜的工作，一個人決沒有精力時間兼為政治家而又為科學家的。僅是政治即使僅僅是某一部門的行政工作，科學家倘使勢非兼理不可，就必須犧牲了一部分研究工作，——甚至是全部犧牲，如竺可楨先生就任

浙江大學校長以後，他對氣象學的研究工作就無形停頓下來了。侯先生在接任永利公司以後，恐怕未必更有時間來從事化工的研究工作了。他之推崇 Benjamin Franklin 也許追蹤莫及，自歎弗如，因而勸別人也休想做政治的兼差罷！作者個人，對這個問題，去年五月號的「科學」裏也有所論及，以為這是各個人自身的抉擇，別人無權，也無法干涉。

至於分心力於政治形勢，却是應該大家提倡的。這不僅為保全科學的成果或是些許的利益，有如永利公司之倖而不為該一時代的政府圍營機構而言；實際上確有其更深一層的理由存在。這就正是中國科協，也正是世界科協的憲章立場——將科學成果必須為人類幸福而服務。科協南京分會對世界科工憲章的討論總結，其第二條云：「科工必須反對維持科學成果以致減縮人類幸福；尤須對運用科學以殘害人類，造成慘酷災禍的黑暗勢力作殊死鬥爭。」第一條是正面的說法：「科工的任務在於運用科學的偉大力量於人類幸福的增進。」要達成這兩項的任務，不論是增進幸福或是反對維持，都要過問政治，而且運用政治。所以，無論就積極的意義或消極的意義來說，科學工作者必須分其一部分的心力注意到政治方面。在科工協會的團結裏，更可以發展共同合作的團結力量。因為政治環境也許可以使科學成果急劇發展，但未必能為人類造福。在同一天同一會場裏許保鼎先生引證了侯先生的論據，承認印度的鋼鐵事業較中國的為發達；然而鑄冶好了的優良鋼鐵却運去製作榴彈子彈，反轉來用以殘殺印度平民，使其永遠屈服為殖民地的順民、奴隸，像鋼鐵廠附近的農民，以雙手十指挖掘泥土，而不是以鐵犁，——還不及落後的中國農民。

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科學工作者於此可以深深體會到政治所及於科學與科學工作者的影

譽；而科學工作者所應擔負的社會道義責任，應該分心力以過問政治，就於此可以了悟了。

中共中原局：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

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這是全解放區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事業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中共中原中央局在九月二十九日為這個問題所發佈的專門指示，值得其他解放區特別是新解放區的參考。

中原局的指示首先分析目前中原地區知識分子的狀況及其與革命的關係，它指出：在中原地區曾在大中學校畢業或肄業學生及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公人務員，數以十、萬計，他們曾經在國民黨極端反動與日趨崩潰的統治下，飽嘗失業、失學、言論身體無自由，生活生命無保障的各種痛苦與折磨，其中大多數已看清國民黨的壽命快要完結，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十分痛恨，對於日益發展的人民革命運動則寄予同情和希望，自我軍進駐中原之後，已有成十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中學生和教師們，都相率來解放區就學，執教或從事其他革命工作。並有不少的知識青年是從蔣佔城市、甚至不遠千里、衝破重重封鎖、冒着生命危險投奔解放區者。這些事實，充分表現了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的熱愛。知識分子是我們在中原解放區培養各項建設人才的一個主要來源，是解決我們目前及今後在各種建設工作中幹部困難的一個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我們在新區建立廣泛的抗美反蔣統一戰線，穩定社會秩序，聯系當地群眾的一個重要力量。所以，大量爭取團結知識青年，就成為當前中原黨的重

要任務之一。但是由於我們在中原地區對於主動地爭取與團結知識青年工作的忽視與某些政策上的錯誤，以及國民黨反動派欺騙宣傳的影響，他們中間還有不少人尚對我黨抱着懷疑觀望態度。又因為他們多半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出身，長期地受資產階級教育的薰染，他們的大多數雖然傾向革命或有傾向革命的可能，但一般都存在輕視工農，脫離羣衆的觀點。因此，要使他們能夠「為人民服務」，「與工農結合」，從事各種艱鉅的建設工作，就非進行必要的宣傳解釋工作與思想改造工作不可。這就是說，要使他們在政治上認識中國革命的形勢、前途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確定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立場，在思想上拋去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的惡習，養成實事求是、虛心學習的作風。要做到這一點，最主要的當然是依靠他們在實際鬥爭中去經受長期的鍛鍊，但事先加以必要的訓練教育，使他們在思想上獲得初步的啟發，則是進行改造的前提條件。

根據上述的分析和已有的經驗，中原局在指示中對於爭取、團結、改造和培養知識分子，規定了如下的步驟：

首先，在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應從政治上去認識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應利用各種機會（如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報告、文娛活動等）通過各種方式（如報紙、佈告、標語、傳單、漫畫等）進行口頭的或文字的宣傳。）說明我黨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方針，指示中國知識分子應走的道路，消除他們對我們的顧慮，使其逐漸地了解我們，靠近我們。

其次，就是開辦各種較短期的學校或訓練班，號召與動員他們來學習受訓。並酌量吸收當地知識分子中有地位有威信的教員學生參加學校與訓練班的工作。在這些學校與訓練班內

，一般地當先學習政治，後學習業務。時間一般至少需三個月至四個月。政治學習以時事問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及我黨基本政策為主。

第三，由各級民主政府召開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座談會，向他們報告詳釋並發動他們討論時事與政策，使他們了解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選定他們所應該走的道路。

第四，維持、恢復或創設新的正規學校（這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特別重要），以便較長期地培養大量的知識分子，並使原有大中學校的教員教授，得以繼續從事教育事業。但目前這一工作的重點，應放在爭取團結與改造現有的知識分子身上。

指示着重指出在實施爭取與改造知識分子的策略時，應注意下列具體問題的正確處理：

(一)各地在舉辦各種訓練班與幹部學校時，要防止產生無政府無組織狀態，要反對自由主義與本位主義，避免彼此爭奪的不良現象。要按照黨的正確政策與統一行動具體進行爭取改造工作。

(二)對於新來的知識分子，生活上（伙食、衣服、學員學習用品等）不妨放寬一點，但思想上則應該提倡「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的艱苦作風。特別是參加訓練工作的幹部，必須以身作則，去影響他們。

(三)在學習中，要提倡民主自由的作風，使學生毫無顧慮地說出他們自己心中要說的話。這是爭取團結與改造他們的一個重要條件。這種思想上的民主與自由，是為着使於青年經過充分的自覺，從爭論和研討中認識真理，而不是對於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採取自流和放任態度。

(四)在這種非黨的學校與訓練班中，必須禁止採取三查、整風、審幹等辦法；而應採用座談會、討論會、辯論會、壁報等羣衆活動的方式，展開思想爭論，解決思想問題，學生和公教人員經過蔣介石多年的特務統治，不免混有少數堅決反革命分子和特務分子，應當由政府予以查究。但是對於普通的國民黨員三青团員，因他們多半是為了求得學習或職業而被迫加入，其餘的也不是堅決反革命分子，故應分別對待。應當讓他們經過一定時期的學習，對我們的政策有了初步認識，顧慮已經消除或減少之後，再動員他們登記或將實情報告一定的組織。這樣既可以使這些雖然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組織，但思想上與國民黨絕少聯系的人敢於說出自己真實的歷史。又可以使少數真正暗藏的特務分子孤立與暴露出來。

中共東北局：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

(一)兩年多來，我們接收了很多大規模的現代化的企業，如鐵路、礦山、發電站、鑛電、工業、市政企業。當接收時，企業內的工人與職員有下列情況：

(甲)企業內有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人，也有很多腦力勞動的職員。工人與職員，同是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編用勞動者。但工人與各級職員在企業的地位和社會地位是不同的。工人每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內勞動條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級職員的勞動條件與生活情況，接近於工人；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帶有舊知識分子那些輕視工人的意識。其中一部份管理人

員，則在日寇、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指揮和壓迫制度下，是習慣於用官僚主義的方法去管理工人的。

「八一五」前，企業內的全部高級職員和一部中級職員，是日本人。「八一五」後，由中國職員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後的中國高級職員，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級職員。當我們接收時，中國中、高級職員是企業的生產及業務管理人；一部份中級職員是職位較低的代理人，其地位接近於下級職員；其餘的中級職員，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級職員提升的高級職員的一部份，其社會地位相當於自由職業者，但在企業內是較高和高級職位的代理人。不管「八一五」前或後，接收時，中、高級職員對工人及下級職員都居於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對於一般管理人員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對於少數為非作惡分子，則是痛恨的。

(乙)工人與職員對國共兩黨的認識，當時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質有差別。工人對國民黨，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統觀念；但一給民主政府工作之後，工人的情緒是積極的，深怕我軍撤退，盼望我軍勝利；下級職員雖然是接近工人的階層，但在企業中工人群眾尚未發動，中、高級職員仍佔傳統重要地位時，下級職員仍多是追隨高、中級職員的。高、中級職員對國民黨政權有濃厚的盲目正統觀念，對民主政府則抱冷淡、抵抗態度；一小部份職員參加了國民黨地下軍破壞活動。由於當時工人羣眾尚未發動，原有的高、中級職員仍佔企業的重要地位，因此當時許多職業內工人甚多，生產很低。

針對上述情況，我們當時的方針是首先發動工人，同時又團結改造職員。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認清自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領導階級，是企業主人翁的一分子，過去是為日寇、

國民黨資本家創造利潤而勞動，現在則為人民大眾、為自己而勞動；同時洗刷撤換了一些為非作惡、為工人痛恨的人員，並恰當地解決了工人與一部份職員之間的矛盾，因此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工人在生產中採取了負責的態度。由於工人羣衆勞動態度的改變，生產力提高，企業的進步，又由於恰當地解決了工人與一部份職員之間的矛盾，因此也達到了團結職員的目的。

今天看來，工人與原有職員在工作中的積極性，雖然有若干差別，但應該指出，職員並連同中、高級職員在內，他們的政治認識及工作積極性，兩年來有了很大進步。進步原因有二：一方面，由於企業內工人羣衆的發動和我們團結職員的政策。另一方面，由於東北戰局的我勝敵敗，又由於國民黨政權的反動腐敗、排斥東北職員的惡劣行為，有了充分暴露，因此打破了職員對國民黨的幻想。因此，應該指出，今天職員情緒與一兩年前比較，大有區別；同時，國民黨政府企業的職員經過兩年的親身體驗，也認識了國民黨政權的反動腐敗。因此，在我新接收或將接收的企業中，也具備着團結改造舊職員的有利條件。

兩年來，處理工人與職員關係問題上，個別企業曾犯過右的和左的錯誤。右的錯誤表現在過於信賴舊職員，而重視工人不夠；因此既不能發工人的積極性，也難改造教育舊職員，使生產力的提高與企業的改造受到了阻礙。左的錯誤表現在只重視工人，輕視職員，對職員缺乏分析，不加區別的亂打擊，形成工人與職員對立，這樣就破壞了員工團結。其最後結果也必然是妨礙生產，危害企業。依據現有經驗，處理工人與職員之間的矛盾，必須根據兩點：

第一、工人是企業中基本的生產力量，但職員也是企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為了提高生產，改造企業，必須體力勞動的工人與腦力勞動的職員合作，並發揚兩者的勞動熱情與工作積極性。

第二、必須根據日寇、國民黨統治時期企業內各種職員與工人之間的不同關係，恰如其分的給以解決；既提高工人覺悟和勞動熱忱，又團結改造職員，達到員工團結、員工互助的目的。為此，我們對各種職員應依下列原則處理：一、職員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下級職員以及既不是生產業務的管理人，也不是人事的管理人。他們之中有很多一部份，雖然具有一般舊知識分子的意識，看不起工人，但他們的勞動條件與生活狀況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對於下級職員應該團結，大體上應該和工人一樣待遇；同時應用教育的方法改變其輕視工人的錯誤認識。

二、技術人員、工程師、專門家、技師，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我們對於一切技術人員，包括思想上還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在內，只要忠於職務，不作破壞活動，都應給以工作，並在生活中給以必要和可能的優待，使他們發揚專長，為人民服務。對於能與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觀念、克服困難、能努力創造的技術人員應予鼓勵。

三、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中專門壓迫工人的特務，礦山中專以額外剝削工人為職業的把頭（不是一般工廠中的工頭），這些人與一般職員不同，他們與工人的矛盾最深，他們是工人最為痛恨的。在人民企業中，決不能允許特務分子和把頭制度的存在，決不能讓原來把頭担任生產領導工作，其罪大惡極而工人要求法辦者，應允許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懲辦及追償損

夫。

四、總務、庶務各部門的主持人員，他們之中有不少曾經仗勢凌人、剝削工人、職員的配給和工資；並且汲公濟私，貧污自肥。他們佔有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於業務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勢力，洗刷撤換這些為非作惡的人，不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數職員的願望。對於剝削和貪污為數重大者，應由企業與職工依法追償。但洗刷、撤換這些為非作惡的主持人員時，必須把這些部門中未曾作惡的主持人員及非主持人員，下級職員加以區別，不應一律對待。

五、生產及業務管理人員，如鐵路的站長、段長、科長、廠長、處長、礦山的坑長、礦長、工廠的科長、部長、廠長等等，這些職員是企業內的中、高級職員，並佔中、高級職員的數大部分。在日偽時期，這些職位的職員的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八一五」後，由中國職員代替了日本人員；在國民黨政府企業中，當我接收時，上級職員的幾乎全體，及中級職員的一部，已被國民黨軍擄走。所有這些日偽和國民黨政府企業內留下的生產業務管理人員，一方面，他們有專門或業務技能，有組織生產、組織業務的經驗，他們在生產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於他們中的多數是日寇、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企業中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產及業務管理人員，他們管的性質及方式雖然不同於把頭、特務，但與工人之間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對於這些人員的使用及他們與工人之間的矛盾的處理，必須謹慎而恰當。

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法，是在剝削壓迫的基礎上依靠一部分組織生產及業務的職員來管理工人，而這種管理，又不能不是官僚主義的方法，所以在生產及業務管

理上所發生的工人與職員之間的矛盾，其形式上雖然是職員與工人的矛盾，但實質上是日寇、官僚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被接收而變為人民企業時，這種矛盾已不存在。但由於上述原因，對日寇、國民黨統治時期由於這種矛盾所產生的工人對管理人員的不滿，其解決辦法不應該是「流血鬥爭」或毆打職員；但忽視工人對管理人員的不滿，也是錯誤的，其結果必然阻礙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因此，正確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工人群眾的批評與管理人員的自我批評、賠償、道歉，以便最後達到團結的目的。

這些管理人員，一般雖有思想上和作風上的毛病，他們的專門技能或業務管理知識，無論目前或將來，對經濟建設和人民企業都是需要的，我們許多共產黨員還必須用心向他們學習這些知識和技能。這些人員中除了少數高級職員，或因本身是官僚，或因在舊社會有特殊地位，不願為人民服務，或因作惡過多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餘凡願為人民服務，忠於職務，不作破壞活動者，都應給以工作。其職務的分配應該照顧兩個方面：一方面必須使其長；另一方面，如果不調離原來職務即將妨礙企業中必須的民主活動和工人的勞動熱忱時，則必須調離原職，給以其他適當工作。凡管理人員在人民企業內工作，生產業務上獲得成績者，應受獎勵。

(二)一般職員，即下級職員、技術人員、生產業務管理人員，尤其是高級和中級職員，他們的勞動態度及對工人的態度與管理方法必須改變。為了改進他們的勞動態度，必須使職員認識：國民黨政權必亡，人民解放運動必成；國民黨政府企業變為人民企業是企業性質的根本改變。過去是企業屬於官僚資本家，因此一切勞動者是為少數官僚資本家創造財富；現

在是企業屬於人民大眾，勞動是為人民大眾，也為了自己。在國民黨政府企業中，用人唯私，在人民企業中，用人唯賢。在舊社會中，科學和科學工作者毫無充分發展的機會，在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將來社會主義社會中，則有無限發展的前途。為了改變職員對工人的態度，必須使職員認識：工人是企業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勞動者。日寇、國民黨政府企業的資本主義經營方法是以皮鞭和饑餓來強迫工人為日寇和官僚資本家造利潤，這不但不能使工人有自願的高度生產情緒，恰恰是造成工人反抗的根本原因；在人民企業中，一切勞動者都是企業的主人翁。生產、業務管理的進行，一方面須有企業規則（即廠規、店規）；同時主要的依賴工人群眾自覺的勞動紀律和維護勞動紀律的輿論。因此，在人民企業中，不應也不能採取官僚主義的壓迫的方法來管理，而必須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方法來管理。

對於職員的改造，是一種思想與作風的改造，是細緻而長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處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與職員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了這個目的，可以採用討論會、座談會、研究班、訓練班等方式。

(三) 為適應經濟建設及企業發展的需要，除原有生產、業務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必須進行思想與作風的改造及培養提高外，一切經濟企業同時必須十分注意提拔優秀的工人、職員，培養成為新的生產、業務管理人員。

(四) 過去接收的日偽企業中，已有一些「八一五」前後加入的國民黨、三青團員。現在新接收的企業中，有更多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國民黨、三青團在企業中曾實行大量吸收黨員、團員和集體入黨、入團的辦法。許多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職員及工人，其入黨、入團

目的是為了保障職業；但其中確有若干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是特務分子，過去員有監視工人、職員的職務，當企業被我接收後，則隱蔽、埋伏從事破壞活動。因此，我們的政策對於不同情況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應加區別；對於為保障職業而加入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應令其登記，並報告入黨經過，在保證不參加破壞活動的條件下，給以工作，但在短期內不可擔任重要職務。對於負責黨務、團務的人員，則必須分清其是否特務分子而決定去留。對於隱蔽的特務分子，則必須提高警惕，從企業中清除出去。

(五)解決工人與職員在生產、業務管理方面有矛盾，改變舊的管理方法之後，在人民企業內，依然必須有人民的嚴格的管理制度與代表人民和國家的管理人員；否則，組織生產，組織業務是不可能的。管理人員中有革命企業的老幹部，有新提升的工人、職員，但其中有許多是舊的管理人員，這些舊的管理人員，當將他們忠於業務、依照企業規則執行職務上的管理時，其所屬的工人和職員，包括其所屬員工的共產黨員在內，必須服從。